

传承与新生：解码中华文明的五重基因

■ 张之秀

淀的连续性，让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总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始终保持文明的韧性与活力。

二、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动力源泉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僵化保守的文明，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推动文明不断向前的核心动力。这种创新性既体现在思想理论的突破、科技创新的飞跃，也体现在制度体系的完善、文化形态的演进。

(一) 思想理论的革故鼎新

中华文明的思想领域始终保持着兼容并蓄、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创新活力。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家提出“仁政”“礼治”，道家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佛教传入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逐渐中国化，形成了禅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先进中国人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思想理论的历史性飞跃，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持续创新，让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不断丰富发展，始终保持着思想引领的先进性。

(二) 科技创新的持续突破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科技创新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举世瞩目，四大发明更是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除此之外，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建筑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样成果丰硕。《考工记》记载了先秦时期的手工业技术规范，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九章算术》确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体系，许多成果比西方早数百年；《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农学著作系统总结了农业生产经验，推动了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本草纲目》集古代医药学之大成，收录药物 1892 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进入现代，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筑牢国家安全基石，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航天工程接连取得辉煌成就，中国正式迈入深空探索强国行列；从袁隆平院士培育推广杂交水稻，以科技力量守护国家粮食安全、惠及世界人民，到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在民生科技领域不断突破。与此同时，高速铁路里程稳居世界第一，5G 通信技术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前沿领域接连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些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持续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能。

(三) 制度体系的与时俱进

制度创新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应对挑战的重要保障。制度文明作为文明的骨架与支撑，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全程，中国制度始终在实践中完善、在借鉴中创新，形成了独具东方智慧、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为国家稳定、民族凝聚、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保障。

中国古代的制度体系在传承中不断完善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秦汉时期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基础，此后历代王朝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赋税制度与法律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走向规范化、体系化。其中科举制度以公开考试、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打破血缘世袭的特权垄断，拓宽社会上升通道，扩大统治基础，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创新成果，更对世界近现代文官选拔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彰显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先进性。

近代以来，面对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国的制度体系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与创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制度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又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立足中国实际进行了创新发展，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制度创新与创新思想、科技创新相互促进，这种全方位的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

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共同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三、统一性：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的深刻禀赋，是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种统一性不是单一化、同质化的统一，而是“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既包含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又有着高度一致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从“九州”观念的提出到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从“书同文、车同轨”的实践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统一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精神主轴，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最核心的支撑。

(一) 地理与政治的大一统传统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历史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春秋公羊传》就提出“大一统”思想，主张天下归于一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历代王朝的政治追求。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货币，确立了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尽管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时期，但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北伐誓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临终绝唱，东晋祖逖“闻鸡起舞”立志收复中原；南宋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兵，无不彰显着对统一的执着追求；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和国家分裂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付出了巨大牺牲。这种对大一统的执着追求，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分裂后重新走向统一，始终保持国家形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当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决心和意志更加坚定。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标志着中国在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上迈出了重要步伐。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种对国家统一的坚定追求，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基因，是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

(二) 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构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最深刻的体现是文化认同的统一性。当波斯帝国的荣光湮灭于黄沙，罗马的法治精神散佚于蛮族铁蹄之下，唯有中华文明穿越五千年烽烟而弦歌不辍。其统一性非赖金戈铁马的征服，亦非凭万里长城的阻隔，而在于一种更深层的力量——文化认同构筑的精神长城。这无形的认同将多元地域、众多民族熔铸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共同体。

秦始皇“书同文”的壮举，实为文化统一的奠基。当小篆取代六国异形文字，华夏大地便有了共同的精神图谱。汉字以其强大的表意功能，使闽南歌谣与陕北信天游得以隔空共鸣，让《论语》的微言大义穿透方言的藩篱直抵人心。司马迁笔下的《史记》不仅是帝王家谱，更是“究天人之际”的文化宣言，其承载的“华夷之辨”早已超越血缘界限，升华为“有教无类”的文明认同。更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在碰撞中主动融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改革，鲜卑贵族改汉姓、习汉语、穿汉服，恰是对文化正统的主动皈依。西夏创制仿汉字的西夏文以翻译儒家经典，契丹参照汉制建立科举，清代回族堂教育将阿拉伯文与汉文典籍并举，都是文化认同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近代面对西方冲击，“保种必先保教”的呐喊揭示文化认同的存亡意义。梁启超疾呼“少年中国”时，其笔端奔涌的仍是“天下兴亡”的文化担当。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徒步三千里护校典，延安窑洞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熔于一炉。改革开放后，“国学热”的兴起与“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更彰显了文化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调适能力。这种超越地域、民族、时代的深层认同，正是中华文明历经劫波而浴火重生的真正底气。

(三) 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格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和发展的，“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从先秦时期的“华夏”与“四夷”的交流融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从隋唐时期的胡汉交融到元明清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既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胡人俑穿着汉式官服，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上的胡姬弹着琵琶，这些文物生动展现了“胡人汉化”与“汉物胡风”的双向塑造。各民族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相互丰富，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更是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核心内涵，成为凝聚各民族力量、促进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旗帜。

四、包容性：海纳百川的文明胸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是中华民族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智慧结晶。这种包容性既体现在对内对各地域文化、各思想流派的包容互鉴，也体现在对外对文明的开放接纳；既坚守自身文

化根基，又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正是这种强大的包容性，让中华文明能够突破地域和族群的局限，不断扩容升级，形成了多元共生、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

(一) 对内包容：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从内部文化生态来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对地域文化的充分尊重。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差异显著，在漫长历史演进中，各地形成了独具魅力、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厚重沉稳的中原文化、儒雅尚礼的齐鲁文化、浪漫奔放的荆楚文化、灵动秀美的巴蜀文化、精致细腻的吴越文化、开放务实的岭南文化等。多样并存、和谐共生的地域文化格局，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与深厚底蕴。

在思想流派领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的尤为鲜明与深刻。春秋战国时期日有秩序面临重构，面对时代变局，诸子百家竞相阐发治国理念与人生智慧。儒家倡仁政礼治，道家言道法自然，法家重法度刑名，墨家讲兼爱非攻，名家重逻辑思辨，阴阳家谈天道时序、兵家论制胜之道，纵横家言外交方略，农家重耕稼之本，各家立足现实、针砭时弊，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群星闪耀的黄金时代，为后世文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

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简单否定或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以儒家仁礼思想为核心，吸纳阴阳家的天人感应、五行生克宇宙架构，借鉴法家的集权治理、刑德并用手段，融合道家的天道自然、清静无为理念，把天道运行与人间秩序贯通起来，构建起一套既符合王道理想、又适应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新儒学体系，实现了先秦儒学的第一次重大整合与创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儒道思想深度交融，士人以道解儒，以儒释道，围绕自然与名教、有为与无为、性情与礼教展开思辨，在坚守儒家伦理的同时吸纳道家的生命智慧，推动哲学思辨走向精微与深邃。

隋唐时期，佛学全面中国化，天台、华严、禅宗等本土宗派成熟，儒、释、道三教并行互补、同台论道，儒学积极吸收佛学的逻辑体系、心性修养与境界追求，道教也吸纳儒家伦理与治世理念，三教交融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宋明时期，儒者进一步融合佛道的哲学智慧与心性修养理论，程朱理学以“天理”为核心，把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严密体系；陆王心学以“本心”为宗旨，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把道德实践落到日用常行，两大学派相互激荡、共同发展，将儒学提升至更加思辨、系统、圆融的新高度，形成宋明理学，推动中华文明思想体系再次实现升华与发展。正是这种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包容互鉴的思想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让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与持久魅力。

(二) 对外包容：文明互鉴的开放姿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更体现在对外来文明的开放接纳与消化吸收上。不同于某些文明的排他性扩张，中华文明始终以“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胸怀，与世界其他文明开展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中不断丰富自身，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与周边国家存在文化交流。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连接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往来，更开启了文明交流的先河。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西传，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而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以及天文学、历法、医药等外来科技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文明深度融合。佛教传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消化吸收，到隋唐时期实现中国化、禅宗、华严宗等本土佛教流派的形成，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更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进一步拓展了文明交流的范围。泉州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国际枢纽，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在此共存，不同信仰的信徒和谐相处，留下了清净寺、开元寺等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遗迹，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思想文化。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再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先进中国人积极探索中西文化融合之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传播与发展，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时代化，更赋予了中华文明新的精神内核和发展动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平等相待，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平台，更是文明交流的桥梁，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推动了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从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卢浮宫联合展览，到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应用，再到“欢乐春节”等文化品牌活动的全球巡演，中华文明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和平性：以和为贵的文明品格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中华文明自古就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始终坚持以和方式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反对侵略扩张、崇尚以德服人。这种和平性不是被动的妥协退让，而是主动的价值坚守和行为选择，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遵循。

(一) “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处理人际关系、族群关系、文明关系的基本准则。《论语》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思想强调在承认差异、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求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反对盲目苟同、强求一致。从个人层面看，“和而不同”体现了尊重他人、包容差异的道德修养；从社会层面看，它体现了多元共生、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理念；从文明层面看，它体现了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的相处之道；在民族关系中体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俗平等思想。中国历代王朝大多采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唐朝对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实行开明的羁縻政策，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允许其保留原有治理模式，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清朝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尊重了民族特色，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

(二) “协和万邦”的天下理念

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华文明始终崇尚“以德服人”“王道仁政”，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国家交往的价值追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这一伟大文明通道并非依靠武力征服与军事控制建成，而是以和平贸易、文化往来为纽带，让丝绸、瓷器、茶叶与冶铁、造纸、凿井技术与向西传播，也让西域的作物、乐舞、宗教与天文历法东传中原，在平等互利的搭建起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唐代国力鼎盛、文化开放，与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及中亚诸国保持密切友好往来，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技术等被广泛传播，而中国也吸收了邻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了互利共赢的交流格局；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遍历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始终秉持友好交往原则，不侵占一寸土地、不掠夺一地财富，以礼相待、通商惠民，传播和平善意与中华文明，留下无数友好佳话。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作出经典评价：“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中国却没有像欧洲那样产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独特品格：即便国力强盛、科技领先，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追求天下太平、万国安宁。这份跨越千年的和平追求，既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更是当今世界化解分歧、走向共生的文明答案。

(三) 和平发展的当代实践

进入现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明确提出“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累计向多个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和警察，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积极推动解决国际争端，在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始终坚持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也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搭建重要平台。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各国超越国界、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异，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与共意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贫困饥饿等全球性挑战。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让文化自信拥有了坚实的道义基础。这种和平性不是软弱可欺，而是“以和为贵”的价值坚守，是“强而不霸”的文明自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人类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强权争霸的文明新道路。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根基，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守民族精神家园；以创新性为动力，勇于推进思想理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让中华文明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以统一性为核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包容性为格局，积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性为遵循，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人类文明进步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